

新中国留苏学生的“洋”婚(下)

◆ 李鹏

当时留学生管理处的报告中曾提到这样的例子:列城音乐学院学习单簧管的中国留学生何某,平时比较喜欢和外国姑娘接近,1961年曾和一罗马尼亚女学生接触密切,关系有些不正常,他们曾在房间里锁起门来听唱片,有时在一起洗照片至深夜。1961年寒假,使馆未点名地批评了一下,以后他立即和这个姑娘断绝往来,在生活作风上也注意了,再没发生这样的问题。使馆党委认为,国外环境复杂,何某继续留在国外学习,有一定危险性,建议暑假回国休假后不再返回前苏联学习,教育部留学生学习管理司同意使馆的意见。再后来,留苏学生的异国婚恋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跨国婚姻也越来越成为留学生政治上的负担和压力,甚至成为考验留学生能否继续留学前苏联的最为重要的指标。

曾经在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工作的陈先玉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从基辅来了一位苏军少校军医,携妻子、女儿来到使馆,他的女儿要求与基辅某高校的中国留学生王某结婚。我根据领导指示精神热情接待,好言相劝,耐心说明两国之间的差距,可是他们怎么也听不进去。特别是女儿,一个劲儿地苦苦哀求,表示‘海枯石烂不变心,若不同意,就只有一死……’我们不得已请示国内,他们的婚事得到了批准。后来,王某毕业携妻子回国。国家对他很照顾,本来应该分配到西北偏远艰苦地区工作,改为留在北京。可是生活上的矛盾显露出来了。女方想吃面包、牛奶、香肠,可是国内一来稀少买不到,二来价格昂贵,王某收入微薄也承担不起。同时,女方不懂中文,和周围的人无法

沟通,只能和丈夫交流。可是丈夫整日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很晚。前苏联妻子感到非常寂寞,萌生了带丈夫回前苏联的想法。于是女方又全家出面,要求中国政府批准王某到前苏联定居。中方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两国关系恶化,苏军少校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就鼓动女儿离婚。离婚后,王某继续留在前苏联,可是处处受到冷淡和白眼。他曾想过回国,可是又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就这样坎坎坷坷地过了一生。”

留学生跨国婚姻更多的还是以分手告终。那些地老天荒的誓言,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在涟涟泪水中,前苏联妻子们登上了返乡的列车,留下的是无尽的挂念和遗憾。

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回忆:“北京政法学院原科研处长洪增仁,就曾经娶了个前苏联的媳妇。但这段婚姻后来也成了一段悲剧。在前苏联的时候,像这样的婚姻都没问题,但一到回国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女方究竟愿不愿意跟你回中国?这是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洪增仁回国的时候,女方不愿意来中国,就留在了前苏联。刚开始还好点,两个人还能有邮件往来,到了后来,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就联系不到了。而洪增仁回国后,很痴情,一直没再婚,单身过了半辈子。”

他们的遭遇,只是当时成百上千异国婚姻不幸遭遇的缩影。据陈先玉回忆,50多对跨国婚姻大多以悲剧收场。

“岁月如歌”硕果仅存

2007年初秋的一天,笔者走进

了上海重庆南路上的一座老式楼房里,这里居住着柳霞(柳德米拉)和她的丈夫戈宁。采访是从半个世纪前的列宁格勒说起的。戈宁教授说,新中国成立前他已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因为搞地下革命工作暴露了,所以受党组织安排撤退到苏北根据地。1951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375名留苏学生中的一员,他被派往前苏联列宁格勒铁道学院学习。1955年1月,列宁格勒市在沙皇时代的塔芙丽特宫举办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晚会,28岁的戈宁认识了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四年级学生柳德米拉。晚会上,两位风华正茂的异国青年一见如故,倾心交谈。柳德米拉告诉戈宁,她的父亲是名军官,参加过卫国战争。战争后期她和妈妈也去了野战医院,才十三四岁的她像个小护士一样,帮着照顾伤员。父亲随军一直打到波兰、德国,可就在1945年2月,战争即将结束时,牺牲了。因有一段在野战医院的经历,中学毕业后她选择了学医。此后,他们的交往多起来,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戈宁教授还特别提到了两个人的第一次约会。那天下午,正当戈宁准备赴约,他的导师找他谈话,谈完后已经晚了。戈宁赶到约会地点时已不见柳德米拉的踪影。戈宁很失望,就在那里转了几圈,正准备离开时,突然,柳德米拉出现了。原来她先来过这里,等了一会儿不见戈宁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好像有心灵感应,她又出来看看。戈宁教授笑称这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

不过,当时有规定,中国留学生不能和外国人结婚,所以,他们只能把这份爱悄悄地埋在心底。随后,戈宁完成学业回到祖国。但老天似乎

很眷顾这对恋人。在戈宁回国几个月后,他在北京接到通知,组织上让他重回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当他重返列宁格勒,敲开柳霞的家门时,柳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1956年,又有好消息传来,国家政策改变了,中苏公民之间可以通婚。1957年,柳霞大学毕业,他们在柳霞家举办了一个简朴而热闹的婚礼。1959年,戈宁研究生毕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留学生学成必须回国,这是当时一条铁的规定。那时柳霞已是列宁格勒一所医院的医生,不过,既然嫁给戈宁,她愿意追随他到天涯海角。

回到了北京,国内的生活状况让戈宁大吃一惊,原来正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在分配工作之前,他们住在招待所里,由于“内外有别”,柳霞得到了特殊的优待——供应米饭和专门烧的几个菜。但柳霞还是吃不下,到了中国后,她特别想念面包、黄油。戈宁对她说,这么好的饭菜你还不想吃,我们只能吃窝窝头。1966年,由于受到政治上的冲击,戈宁被调回上海,在上海铁路局科研所当工程师。经人事局安排,柳霞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内科当医生。她可能是上世纪60至80年代上海唯一的一名外国大夫。从1966年到1989年,柳霞在上海工作了23年,她于1986年被评为卢湾区卫生局先进工作者。1992年,她还获得了一份“荣誉证书”,上书:巴巴斯基娜同志从事卫生工作30年,特授予荣誉证书。

当笔者询问到这些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戈宁教授短暂停顿了一下,缓缓说出了埋在心中的话:“如

果说最大的遗憾,那就是亏欠儿子太多。”儿子阿列克谢在列宁格勒与外婆相依为命,柳霞来到中国后刚开始只能寄点钱过去,对儿子的思念时常折磨着夫妻俩,给儿子写信是交流的唯一方式。随后由于国内的政治运动影响,夫妻二人递交的赴苏探亲申请迟迟没有下文。直到1982年,他们才得到了批准赴苏探亲。当柳霞坐了近一个星期的国际列车,再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列宁格勒,时间已是1983年元旦的清晨。她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这是谁啊?哦,是妈妈!”儿子又惊又喜。柳霞把日思夜想的儿子紧紧抱在怀里,泪水喷涌而出。母子重逢这一刻,实在来得太晚了。儿子已经是25岁的大小伙子了。令她欣慰的是,阿列克谢“子承母业”,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市急救中心当了一名医生。

这样的跨国婚姻在上海有多少?当笔者询问这个问题时,戈宁教授回忆当年像柳霞这样和中国留学生结婚后来华的俄罗斯女性,上海共有四位;另外三人中,有两人在大学里教俄语,一人没有工作。但后来由于政治运动频繁、社会动荡,孩子没有书读,她们都和中国丈夫离婚,回前苏联去了。只有柳霞,历经生活的艰辛、政治的风雨,仍忠贞不渝,无怨无悔,将自己的命运和上海这座城市紧紧连在了一起。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但是,伉俪的举手投足之间始终有一种荣辱不惊的镇定和淡然。

(本文是国家课题“新中国初期留苏教育研究”[1949-1966]的阶段性成果)

摘自《档案春秋》2016年第11期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16.出台新的奖励制度

自从担任上海杂技团演出二队队长后,程海宝转而将《大跳板》作为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大跳板》,是上海人民杂技团的传统大型集体节目。程海宝主攻力量型的大型集体节目,可以说是责任重,难度高,练功苦,付出多,出国机会少。辛辛苦苦地拼搏,出了成绩,功劳、荣誉都是集体的。他做出这样的选择,难道是傻了吗?不,他的心里清楚得很。这是一次转轨,一次展现创造才华和拼搏的机会,对于他来说,时不我待,机不可失。他说:“我知道练《大跳板》很苦,但我愿意。大型节目所体现的,不是苦不苦的问题,而是展现我们杂技团的实力和演员的演出水平。杂技艺术需要发展,需要高水平的大型集体节目,更需要有人自讨苦吃,我要是能够为此出一份力,也是尽了我应该尽的责任。”

程海宝没有用更多的舞台语言进行表白,而是带着他的团队认真地甩开膀子干了起来。此后十多年,他一直痴心不改,继承、创新,在他的带领下,《大跳板》不断砸出了新的高度。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地掀起了改革之风。沿习了数十年的旧管理体制,极大地束缚了劳动者的创造热情。杂技团建团以来,也是由国家“供给”,保证了演员人员的工资收入和杂技团日常运转所需要的费用,同时也抢救了一批濒临消失边缘的传统杂技节目,推动了杂技艺术的繁荣发展,而与之并存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束缚了编演创人员的积极性。

1978年秋天,演出一队赴江苏镇江、常州、无锡一带巡回演出。演职人员在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回收一只水泥袋,奖励一分钱》。犹如一块石子投向了河面,立刻引起了连锁反应:一分钱?这也算奖励?能起到作用吗?大家议论纷纷,举一反三,痛感这样的奖励机制不合理,必须改革。演出队按照合同巡回演出,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场次,这是“计划



内”。但如果应观众要求加演,算什么?属不属于“计划外”?由此创收的这部分,能不能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用来奖励超额演出?如果连这

点都做不到,还有谁愿意加场演出?不如干脆回家休息得了。

多演多得,不演不得,应该不应该?越议论,大家越是感到象征性的“一分钱”奖励机制必须破除。额外加演一场,收入大约为360元,按10%比例提取作为奖金,大约36元,算下来,每个加场演出的演员大约可以有0.6元的奖金收入。区区0.6元,多不多?平心而论,不多。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演职人员中引起的反响不小。演员们喊出了增演增收的“第一声”。孰料,由于奖励“新政”没有上报审批,增演增收的改革举措不久便半途夭折了。

改革,遇到了阻力。仍然沿袭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旧制?或者,也实行象征性的“一分钱”奖励?不!杂技团打算尝试新的分配和奖励机制。经过充分酝酿,不久便出台了一份新的奖励制度:《增演增收给予演出补贴办法》。杂技团下设三个演出队,程海宝负责演出二队,另外的两个演出队是:演出一队、青年演出队。《办法》出台以后,牵一发而动全身,三个演出队的士气大振,人人都想多演出,多创收。为了多演出,三个演出队都在演出质量和节目的新、难、奇、巧上下了一番苦功。

上海杂技团的奖励制度改革,得到了主管部门的支持。上海文化局专门下发文件,决定在系统内推广试行杂技团的奖励制度改革方案。文件直指陋规陋习的“痛点”,明确规定:凡是完成经费指标、演出场次指标(有收入的)、下厂下乡下部队演出指标等三项指标后,经费结余可以提取百分之七十作为文艺演出团体的奖金,其余百分之三十上缴,奖金的分配使用由本单位决定,主要用于购置业务设备、集体福利。它的主要精神是增演增收,国家、集体、个人三得益。

很快,国家文化部也以“一号文件”向各地文艺院团推广上海的创新和改革举措,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光明日报》《上海戏剧》、文化部《文化工作简报》以及相关媒体纷纷作了报道。

这是曾经震惊全国的沉尸案,著名企业家为何被杀,公安部门怎样破案,铁笼内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为解开这起骇人听闻的铁笼沉湖杀人案,公安机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侦查追寻杀人证据,耗时两年半,最终揭开了谜底。

1.寻找铁笼

这是一只长宽高均不足1米的自制铁质猪笼,这只铁笼沉在百米深的水底长达840多天。为了让这只铁笼重见天日,杭州下城警方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前后实施了4次大规模搜寻行动,终于使之成功打捞出水,而完成了全国公安史上难度最大、足以载入刑事侦查史册的深水打捞!下城警方为何要如此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地搜寻这只铁笼?这又是一起什么样的凶案?它的来龙去脉又如何?

2014年12月28日,浙南地区青田县,千峡湖(即滩坑水库)巨大的湖面上。冬日已渐渐斜入西侧,湖面上波浪起伏,寒风一阵紧似一阵。一条钢质驳艇一直在忙碌,这是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6·10”专案组的工作驳船。此时,执行搜寻打捞任务的民警和专家都在紧张工作,端坐在监视仪显示屏前的专案组人员,仔细监看着水下机器人“老虎”(简称ROV)从百米水下传输回来的每一帧水下影像,不放过任何一处疑点。四周静寂,人们甚至可以听得见彼此的心跳。

“这是什么?大家快来看!”下午4点多,下城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吴信炎在淤泥翻滚的水底中,发现了一个形似脚掌的物体。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不禁“疯狂”地大喊。众人从未见过一向沉稳镇定的吴大队长竟如此“失态”,便从打捞工作船的各个位置向船舱中央飞快地跑过来,围紧在显示屏前。

没错,这是一个人的脚掌,不可能是别的東西!ROV操控专家殷宏伟操控着水下机器人“老虎”,从各个不同角度一遍遍扫描这一物体——人形脚掌更清晰了,它的轮廓、形状、表皮……接着,众人又渐渐看清了类似铁笼档子的铁条。

现场的气氛紧张而兴奋,每个人的心都被提到喉咙口。一直在打捞现场指挥的下城

公安分局副局长巢震宇竭力控制住激动的情绪,命令在场的专案组成员反复察看验证。“老虎”便绕着这目标继续缓缓转圈。专家组一致确认:显示屏上这一铁笼状器物以及笼内人形物体,确已寻找了两年多的此案关键证据。该物体位于北山大桥8号桥墩东南方向4米处的一条深沟中,距水面深度为83米。

“找到了,找到了!”终于,再也遏制不住兴奋的众人放声欢呼,因长期的辛劳而累积在身上的压力,一下子释放出来了。

是,就在这天上午,持续多日的第四次搜寻工作又经历了一次失败,原本以为希望较大的一处水底,虽经木篦梳头般反复搜索,最终无功而止。当筋疲力尽的人们懊恼又白耗了不少时间精力时,难免泄气。有几名年轻民警蹙紧眉头,拉着电缆,嘴里呜呜叫着,恨不得钻入这深达百米的水底去探个究竟。人们好不容易才让自己平静下来,一边继续思索下一步的行动。

正午过后,太阳慢慢西斜,但天色还未转暗。趁湖面波浪稍缓,众人调整好心情,再次鼓起勇气,准备进行新一轮搜寻。此刻,众人忽地想起有一位当地船老大说过,北山大桥8号桥墩下面,原先是一条七拐八折的盘山公路,两侧山高约为11米。水库蓄水后,这两座山之间的公路便成了一条深沟。这沟究竟有多深,沟里有没有容易缠牢“老虎”的异物,这些都不知道。没错,去那儿探寻不无风险,万一像上回那样“老虎”被杂物缠住,十天半月不上来就麻烦了。但在连日搜寻都没结果的当口,是不是应该去那儿探个险?专案组经慎重研究,决定在尽力保证人员、设备安全的前提下,让“老虎”向那个未曾探测过的疑点移动、搜索,再移动,再搜索……

谁知,数百天的期待和努力,竟然在这一天有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众人放声欢呼过后,巢震宇副局长等专案组成员初步分析,装有人质的铁笼是在往千峡湖推下去时,先落在了水下的山梁上,又沿着山坡,翻滚到了山间这条公路一侧,这个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铁笼沉湖杀人案侦破纪实

孙侃

